27

目　录

前言……刘洪文

忆父亲喻训庭……喻世长（1）
张连生传略……张殿成（10）
张连生轶事……张殿成（19）
一代巨将——尚和玉……张宝年（24）
金叶子和西路评戏……刘章如（32）
纪东流传略……纪长安（34）
历史不能忘记的人——张善周……王静泉（39）
王如恪轶闻……吴丙中（47）
张兴泉与兴泉药房……宋　健（53）
我所知道的宝坻中学……沈国瑞（57）
元代名塑家刘元……恒　庐（61）

赵各庄歼敌记
　赵各庄战斗的战略形势及我军的部署……李尚武（64）
　赵各庄歼敌……武　宾（67）
　记赵各庄战斗……闻　煜（71）
　战场拾遗……闻　煜　王玉祥（78）
火烧北大洼惨案
　火烧北大洼之始末……王静泉　吴丙中（86）
　火海轶事……张　栋（92）
记大吴庄惨案……杨　芹（95）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广济寺……吴丙中(100)
大觉寺……恒　庐(105)
石幢金顶……吴　影(107)

宝坻历史沿革……骆志安(109)
京东第一集……张宝年(112)
宝坻漕运史话……吴丙中(116)
宝坻不是古泉州……吴丙中(119)
宝坻县的理发师傅……宋　健(123)
宝坻银鱼……李执中(127)

编后记……编　者

China

忆父亲喻训庭

喻 世 长

喻氏家族的远祖都是南方人。江西省有新喻县（现改新余）、湖南省有喻家嘴（属慈利县）、武汉市有喻家山可以证明。我们这一支定居在天津市宝坻县（原属河北省、清代属直隶省顺天府）的喻家是明末清初从湖北省武昌府江夏县迁徙来的。由于累代和北方人结婚，从体型到性格都变成北方人了。历史上喻家没有煊赫的人物，也不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或殷实的富户。虽有相当宽阔的墓地，但没有一块碑碣。从湖北北迁的第一代及以下几代的祖宗的名字，现在已无法查考。但同族人的辈份都清楚地知道。我父亲是北迁以后的第九代，我叔祖手里原有一份从第二代以后的家谱，他死后随着他的诗文手稿一起失散了。

为什么不远千里迁到北方，我祖父的弟兄辈已经说不清楚，只是推测，或是经商或是作吏（县官下面的文书）。书香门第，诗礼传家，这是十代人从未中断的传统。所以我家堂名“继香堂”（堂名是家族的称号）。我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三代，都有考取“功名”得中秀才的。高祖父被当时的秀才们推举为“乡贤”，在孔庙里有一个牌位（孔庙前院罗锅桥左侧为乡贤祠，右侧为节孝祠）。这是说的居住在宝坻城内的一支。另一支居住在城西的喻家庄，虽以务农为主，子弟也多读书，并有外出谋求生路的。

我父亲喻以言字训庭，生于1886年。幼年学名以健（因幼年身体孱弱，希望活得健康才得这个名子。我保存有他的老师①为他写的书皮上的名字可以证明），后改以言，是从《论语》

中陈亢和孔子的儿子对话中“不学诗无以言”一句取意的。他幼年生活的家庭属于中上等——有宽敞高大的住房和为祭祖取得收益用的坟地。1900年前后，家道突然衰落②，变成了城市贫民。在他的舅父（姓赵、住城内宽街）的援助、和我祖父曾启的堂弟、父亲的三叔曾培的教导下，父亲学到《四书》、《五经》、《左传》诸书，所以他有很好的旧学问的基础。

如果不是遇到了历史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再学会了写“八股文”，就可以考秀才了。但是，封建落后的中国，到了非革新不可的时候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朝皇帝下令，废除科举制（县考“秀才”，省考“举人”，都城考“进士”，点“翰林”），设立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仿效西洋，兴办学校。

父亲跟上了这个前进的思潮。当1906年左右，宝坻县在县城的东、西、南三关，各立一个小学堂（因为城内有孔庙，如在城内设立读新书的学堂，在知识界阻力太大，所以把学校设在四关）时，他接受了担任东关小学堂教习（当时不称教员）的聘请，成了宝坻县最早的新式学校四位教师③中的一位，那时他才二十岁左右，是最年轻的一位。阿剌伯字码的算术是自学的，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对译关系是他的叔父曾培帮助指点的。

他担任教习以后，全家生活有了保证。此后，他就把国家复兴与家道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立志为本县培育人才，当一辈子老师。

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兴起的白话文运动，联系着在语言上的国语运动。教育部之下设立了读音统一会。以北京话为国语，汉字的读音以北京音为标准，进行统一。1913年制订了便于推行统一读音的注音字母。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国语运动的先驱者王照等人在北京创办注音字母讲习班。当时宝坻是京畿附近京兆地区（大体相当于清代的顺天府，首长称为京兆尹）管辖的二十个县之一，所以由县里保送父亲去学习注音字母和白话文。这

样，他就成了宝坻县最早懂得拼音原理的学者。他的新学问就是这样开始积累的④。

在得到不同的帝国主义豢养和支持的各派军阀——统称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学校制度是朝令夕改的，提倡白话文和恢复文言文也是变化不定的。但是民众要求学知识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学校一直发展着，农村也办起来了。为了培养师资就开设了各种性质的师范学堂和师资讲习所。父亲是入了初级师范学堂，取得毕业证书的⑤，他的学历比同时代的其他教师还稍高一些。

1920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他在武清县担任“巡行教员”，等于后来的县“督学”，责任是视察全县各地小学，听课，作示范性讲授，给教员以具体辅导。后来因为抚养年老的双亲和教育两个儿子（我和弟弟）的需要，辞去武清县的职务，回到宝坻城关小学任教。

军阀混战期间，我家生活朝不保夕。我上小学时，早上父亲给我一两个铜板（宝坻叫铜子儿）买烧饼果子吃的事是很少的。父亲因为受人尊敬，有钱人肯低息或无息借钱给他。他经常在负债的情况下维持全家生活。父亲已经过了四十岁。人到中年了，自己在坎坷的命运中唯一希望的是社会往好的方面变，国家转弱为强，否则自己也没有出路。

1927年，蒋介石统一了全国（有些地方只是名义上的，割据局面并未完全削除），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结束。1928年（民国十七年）蒋系的军队（领兵人叫陈调元，系安新县白洋淀同口人）进驻了宝坻。上面派来了县长荆壬秋。他有一点民主作风，也做了一点访贫问苦、结交贤才的事，父亲和他相识了。父亲问他，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二十几条能否实现时，他向父亲宣传了孙中山的思想。当时宝坻县的知识界只知道国共合作、北伐，而不知道蒋介石的叛变革命，所以贫苦的知识分子都对1928年宝坻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变化抱有希望，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北京、天津私立中、小学很多，父亲想在家乡自己办一所私立小学，既可以满足朋友们对他的希望（朋友们和他谈话的内容之一是学校师资不整齐，子弟学不到真学问），也可以使自己的教书工作得到稳定（当时宝坻教育界有南北两派，互争县教育局领导权，胜者可以在县立小学多安插自己的亲信），他办学的想法得到了县长的支持，1928年，喻氏私立小学诞生了。地址在临近城区东北角的灶君庙⑥。

在此以前，我父亲已在本县和武清县教育界工作了二十多年，有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且能够体会学生家长的要求——光学白话文，光学笔算，到毕业以后不能应付社会的需要。人们把当时的小学毕业生和科举时代的秀才相比。秀才能读古书，会分辨“五服”（用宗族的亲疏推算丧服的“五服”之礼），会写老式的“讣告”，会写婚帖（订婚交换的“小帖”，结婚交换的“大帖”），为水火会等公益事业募捐写“启事”。这些都要用文言文。可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小学毕业生就不会这一套了。当时小学毕业后能升入中学的寥寥无几，再能升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大部分到本县、天津、东北各地商店当学徒。进商店的条件是要会打珠算，会用毛笔写信。谁的毛笔字写得好，珠算盘打得快而且准，谁就被提拔得快。

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喻氏小学一方面完全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学制，讲授全部课程。在此以外，适当加授《古文观止》、《左传快读》以及尺牍珠算课程（后两门课公立小学还有时开设）。这样，毕业生既能达到报考中学的程度，又能满足到社会就业的需要。所以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两三年内就从单级学校（即初小的四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之内，当时农村学校都是如此）发展成为一至六年级一贯的完全小学了。

学校的经费来源有三：一是从社会上募捐（举办过一次演唱

义务戏筹款），二是校董赞助，三是学生的学费（每人每期五元，困难者或减或免）。学费数目比公立学校高，但有见识的家长都愿把子弟送到这个新旧兼顾、升学就业两便的学校来读书。

当时规定高级小学要讲授“党义”一课，讲三民主义，并且要由国民党员担任教员，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征求我父亲的意见⑦，如果他参加国民党，就由他教这门课，不必由县党部派人去教了。我父亲同意参加了国民党。

清朝，宝坻县属于顺天府，临近京畿，旧文化比较高。辛亥革命以后，大城市的商业也波及到这里。用洋纱手工织土布的行业相当兴盛，农村起了变化。山西人来开当铺，行商坐贾云集县城⑧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文化教育的要求。喻氏小学在适应社会进步，满足社会要求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与公立学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公立小学受到了私立小学的挑战。

1935年左右，宝坻县教育局长换了新人⑨，决定用阴谋手段来搞垮喻氏小学，具体作法是：买通河北省教育厅督学张陈卿来宝坻视察学校，因为要搞阴谋，就要背着我父亲干，所以偏偏不到喻氏小学去视察，却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大堆喻氏小学的罪名，回到省城，给河北省教育厅打了一个扯谎的报告。教育厅就在1935年下了一个勒令喻氏小学停办的命令。我父亲除写了一封辩诬的信上报以外，主动提出了改组学校的办法，即他本人离开，由原来的其他老师继续办下去，改称育实小学，大约两三年后停办。

这时，不但城关镇，而且全县各区乡都知道我父亲是教育界的耆宿，因为他有三十年的教龄，对于新旧文化的衔接，新旧教学法（旧法重背诵，新法重启发）的结合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界的人无论当面或背地都称他为老师而不冠“姓”，或称为训翁而不称名。他从喻氏小学出来是不会失业的。有好几个学校争着聘请他。他选中了县东南七十里的水乡——张头窝，在那里执

教直到七七事变。

日军侵占了整个华北以后，建立了伪政权，在他们统治之下的老百姓也还是要求给子女以上学受教育的机会。芦沟桥事变两年以后（1939）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属下的河北省宝坻县来了一位年轻的教育科长。他探询住在城关附近的有哪些有威望的教育家。经过群众的推荐，他把喻训庭和李勉庵请到县政府教育科，谈话以后，他要求我父亲出任男子小学校长，李勉庵出任女子小学校长。他们都已经是五十余岁的人，都经历过了满清皇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度统治，目睹本县人民生计艰难，教育落后的情况，都想把学校办好，多一些学生到外地考上中学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难以有所作为。唯一可以做到的是，从文化高的北京市天津市延聘教员来宝坻任教。本县人在北京、天津、通县师范毕业的也从中择优聘请回县。一改几十年来县立小学教师队伍不整齐，因裙带关系而进去的无能教员夹杂于其中的局面。家长十分高兴。

教育局听到了一些对于父亲和李勉庵的谗言以后，把两个人的职位做了一次对调。到1942年就双双免职了。在敌伪统治下，只懂得认真办学的人得到这个下场是合乎逻辑的。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6年八路军解放宝坻县城，这时父亲在刘举人庄教书。当时我早已大学毕业，也在教书，但是我的工资只能养活自己。当时祖父母和弟弟都已故去，父母和几个妹妹的生活靠父亲教书维持。他一停止工作全家就要饿肚子。

1946年宝坻实行“土改”。凡是类似城市贫民那样经济状况的知识分子家庭，都划入“贫农”的行列。因此土改时我家定的成分是贫农。分给了城东六里高八墅村四亩土地（到合作化时献给了当地的初级社）。

在宝坻县城从国民党占领军手里解放的过程中，有人给父亲造了谣言。又因为父亲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参加过国民

党，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折磨。但是他一生没有当过官，只是靠着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的生活，所以也给他安不上什么罪名⑪。

1974年8月17日父亲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自然会想到自己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桃李满全县；想到自己在解放以后，以耄耋之年还为新社会做了一些好事⑫；想到自己的子女都为新中国服务，一定是安然与家人永别，含笑九泉的。

以上所述是父亲的简略生平，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查阅一些有关材料而写成的。在文章结束以前我还要补充两点关于父亲品德方面的话。

一点是父亲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第一是孝敬父母。父亲有一兄一弟两妹。父亲始终独自担当赡养父母的责任，从无怨言⑬第二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有时伯父和叔父来了，因为他们无力奉养祖父母，祖父对他们加以训斥。但父亲从不附和，并且总是热情和睦地对待兄长和弟弟。两位姑母也都从父亲那里得到温暖。第三是教子女严，要求作正直的人，学会真本领。促成了我和四个妹妹的成长。

另一点是对朋友和自己的学生的热情。平时来拜访的朋友总是不断。有的朋友失业了，生活困难，他千方百计帮助朋友找到职业。多年不见的朋友来了，住上十天半月，总是殷勤相待。在北京天津结交的朋友，友情一直保持到老⑭。

父亲生在国家新旧过渡的时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贡献主要在本乡本土。他没有白白地喝故乡的水，吃故乡的粮，他为宝坻的教育事业，费尽了一生的心血。故乡的人民怀念他。他无愧于他所生的时代。

作者简介： 喻世长，宝坻城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①清朝科举制度，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省考举人，翌年，即丑，未、辰、戌年京都考进士.都是三年举行一次.南方江、浙、湖广的举人，如果来京考进士落榜，就在京都附近各县找一个教书的家馆教书，等候下一次考试.只求馆东给以温饱，束修不高.除本家子弟外，别家子弟也可以来就读.我父亲十来岁家道败落以前，曾到一家请有南方举人的教师的家里就读，那位老师姓沈。

②我曾祖父行三，弟兄四人.1900年以前，四户已经分居.各家都有高大的厅房以及少量的田产.曾祖父的长兄在县衙里面管理财政方面开"钱帖子"（类似现在的支票）的工作.开出的钱帖子是可以兑换现银的.因此绝对不能超过预定的数额.可是他违反制度开多了，也就是贪污了，并和另一个子弟一起浪费花掉了.此事被查出以后，要判几十年牢狱的处罚，但是如能补足冒开的银两，另加若干罚金，就可以免刑.这与三个弟弟本来无关，但出于手足之情，三个弟弟都变卖了房地产，凑足银两从狱中赎出兄长.我家就这样突然败落了。

③我上小学时学校已设在城内.初小在学内街，高小在东街.教育人士回忆兴办新式学校的历史时，要讲出四关四个学校老师的名字.我听过讲胡子吉、白观渔、和父亲共三个人的名字，第四位的名字忘记了。

④父亲到北京学注音字母时结识的懂新学问的朋友有，刘汉章、王慈臣、王璞如……。

⑤当时师范学校分优级、初级两种，优级师范设在保定.通县、武清大概都设过初级师范。

⑥当年宝坻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穿城河，河水由北水门引入，南水门流出.城关附近有九桥十八庙.现在草场街北头原有一桥（架在穿城河上.桥西那段穿城河，现在尚未填平），桥东北有一半岛形平地，平地东南都是荷花池.灶君庙就在这个半岛上.往东半里，东城墙上有文昌阁（阁字乡音读稿），往北半里北城墙上有真武阁，这两个阁都是依靠城墙做为后檐，都是两层楼阁.灶君庙、文昌阁、真武阁三处连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

⑦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人员我听说过名字的有苏益亭、严宝森、任竹溪三人，苏和严住在北京.小学教员要家中有点产业和当权派有点拉拢才能加入国民党.当时初小、高小教员中有四位姓刘的（不是一家子），有两

位在高小教书，教得不好。同学们传说，不要惹他们，他们是国民党员。

⑧宝坻原有土法织布的行业。从纺纱到织布，都用手工。最早的织布机是手拉式的（乡音叫做扽授机），后来进步为脚踏式的（两脚踏两个板，织平纹布，两脚按一定程序踏五个板织斜纹布）。天津商人在宝坻设店。从天津用"花轱辘"骡马车运洋纱来，农民交款提去洋纱织成布。这时织布机又进步为脚踏的铁轮机，脚踏速度大大加快。织成布交到商店再换洋纱以及加工报酬（钱或纱）。除供本县人穿用外，1930年以前，远销东北各省。除每旬一、三、五、七、九的集期有布匹买卖交易以外，每逢二、八日在草场南面南北小巷也有买卖布匹的。当时称这个巷为"布市"。

⑨教育科长是苏屯子的张勋谦。

⑩1929年以前宝坻城内没有中学，要上中学得去本县城北四十里的新集镇或京、津、通。1929年在城内西北隅城隍庙原址改建中学校舍，筹办中学，到招生时，河北省教育厅规定校名叫做"乡村师范"，后来改为"简易师范"。

⑪当时把日本投降以后投靠加入国民党的称为新国民党，七七事变以前加入过国民党的称为老国民党。人们知道父亲是老国民党员。国共双方争夺宝坻县城时，国民党到北大洼烧过庄。谣传父亲也去了。父亲一直为自己辩诬。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出来为父亲作证说"他没有去"。

⑫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部队进驻宝坻，部队负责人安林同志，经李松云介绍，认识了我父亲。安林同志委托我父亲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到北京找我（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去天津联系一个人。这是为攻取北京采取的措施。我去了，没有联系上，后来北京和平解放了，安林同志成了父亲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解放后父亲年老不能担任全日制学校教员，当过民校教员和税务征收员。

⑬我的祖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1900年左右家道突然衰落以后，他到北京西山任私人小煤窑的会计。义和团失败后，清政府命令直隶总督组建一个去黑龙江漠河开办金厂的班子。正经理称为"督理"、付经理称为"提调"，（都姓刘）下设文案（秘书），收支（财会）、粮货（总务）三个委员。祖父担任金厂收支委员，在漠河工作两年。我手中有他留下的一把俄国起罐头的刀，现在仍保存着。

⑭我能记忆起来的父亲朋友的名字有：程耘（沛亭）；芮毅贻、王润敷、王穆如……。

张连生传略

张殿成

张连生（1871—1944），一作张联升，字仲三，清同治十年正月初四出生于宝坻县烧角村。民国年间，历任统领、混成旅旅长、襄阳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三十八军军长（陆军中将军衔）、西北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国务参议、山东省高级顾问等职，为本县民国年间最为著名的历史人物。

一、贫困的青少年时代

张连生出生时适值清朝末叶，由于晚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不聊生，兵灾匪祸不绝，帝国主义趁机侵入，外侮日甚。几个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本来贫穷落后的中华民族受到极大伤害，天津地带更是首当其冲，民穷财尽。宝坻加之地势低洼，水灾频繁，人民生活更为艰难。张连生家境贫寒，自幼随父务农，或为他人扛活放牧，挣来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张连生虽在贫寒中长大，但身高体壮异于常人，十几岁便高逾成人（成年后身高二米有余），食量力气过人。喜吹笛，好听说书讲古，为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张连生娶妻后，几个弟、妹相继长大，家中生活负担加重。当时宝坻城南一带地卤瘠薄，熬土盐（俗称小盐）者甚多，除自食外尚可出售。又由于地近滨海，贩卖私盐成为人们乐为的最能牟利的营生。那时，官府对食盐实行专卖，控制极严，禁止任何私人贩卖。但是，私盐价廉畅销，本微利厚。张连生与本村人借了

一条毛驴，加入了贩卖私盐的行列，借以养活家小。但不久便被官方盐警查获，本利皆失，在家乡已无法存身。被逼无奈的张连生豁然决定到芦台投军。动身的当夜，其妻为之缝制好最后一件衣服后，感到丈夫投军生死未卜，生活绝望而悬梁自尽。已无回路的张连生从此步入军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二、戎马生涯

投身戎伍后，张连生因身材魁伟，站在队伍中如"鹤立鸡群"，而被拨至伙房当了伙夫。某次从船上搬卸大米，其他人用肩扛一袋，而张连生双腋各挟一袋，健步如飞，被一长官赏识，问张可否制服一匹人不得近身的烈马，张连生欣然允诺。进入马棚后，张连生凭藉自己幼年放牧的经验，解开烈马的缰绳，伺机飞身跃上马背，烈马驮载着张连生狂奔而去。张连生双腿夹紧马腹，任马狂蹿乱跳，终于将烈马制服。长官大喜，当即赏张连生以牌头职衔。张连生深知"非艰无足以立业"的道理，临阵勇武过人，在几次平叛中立下功迹，被送入保定将弁学堂学习。毕业后，因其身材魁伟高大、五官端庄、仪表出众，被李鸿章选中司掌大旗。光绪末年，张连生任毅军下级军官，随姜桂题南下，办理长江防务，驻扎浦口。1908年，张勋接任江防军都统，张连生成为张勋的部属，被提升为统领。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张勋任江南提督，率部在南京对抗革命军，失败后，率残部退驻徐州。以张连生为统领、赵荣华为帮统的三营江防军未及撤退，被革命军收编。张连生依附林怀庆，后归附黎天才。嗣后，部队辗转调至湖北，黎部编为陆军第九师，黎天才出任师长，张连生为旅长。

1917年，辫子军统帅张勋进驻北京，以武力逼迫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下台，演出了一出不得人心的复辟清廷的闹剧，开始了中国的军阀割据时代。此时，湖北发生了荆襄自主事件，荆州镇守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政府。张

出于维护统一局面和顾念张勋旧部之情，竭力反对黎天才等自主行动，毅然率本部一旅人马移居河南南阳，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麾下，被吴任为中央陆军第十七混成旅旅长。1918年1月25日，吴佩孚派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攻占襄樊，黎天才率残部逃至四川奎府县（民国后为奉节县），张连生随之再度进驻襄樊。吴佩孚为网络亲信，又升任张连生为直系直属第九师师长，并取代黎天才接任襄郧镇守使驻镇襄樊。不久，张的本部由襄樊迁驻老河口。

三、襄阳镇守使

从1918年，张连生出任襄阳镇守使始，到1927年，为其军旅生涯中最为得意的十年。军政大权揽于一身，独镇襄樊二十四县，为襄樊地区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其间最显著的政绩是修筑公路，至今犹为襄樊地区人民所称颂，尊为“襄花公路”的创始人。

1918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受欧美先进工业国家的影响，开始发展汽车工业。国内舆论界也鼓吹道路建设是当时的第一要政。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盘踞洛阳的北洋军阀吴佩孚为全面控制河南、湖北两省，深知汽车运输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早有修筑以洛阳为起点，经南阳、光化至樊城，再由樊城转枣阳、随县、安陆达孝感花园与京汉铁路衔接的军用汽车路计划。对于湖北境内的修路任务，吴佩孚委以张连生及随枣驻军旅长潘守燕共同完成。

当时鄂北山区各县均有罂粟(又称阿芙蓉)的种植，提炼鸦片烟（俗称大烟）。贩卖鸦片颇能牟利，张连生驻节襄郧，手握大权，奉吴的旨意后，疾趋而进。1920年，在张的直接授意下，驻镇光化县的十七混成旅三十四团团长王宗荃采用军事高压手段，当年修通衔接河南省边境的孟家楼至老河口一段二十五公里长的汽车公路。旋即张连生指派本部杨参谋督工又筑成枣阳西至大庙子一段计长三十四公里。

为全面实现吴佩孚的计划，又为便于鄂北经营鸦片迅速转运至京汉铁路而销往全国各地，从中牟利。张连生以襄(阳)郧(阳)两地遥远，所有军事调遣均感困难为理由，提出官办修筑老河口至花园的军用汽车道路。但此项倡议，事关路权利益，遭到随县、安陆、应山等县商绅的抵制，后经反复协商达成妥协：全路划分南北两段，北段（老河口随阳店）由张连生官办兴修；南段（随阳店至花园）由沿线商绅筹建。

从老河口至随阳店（后称襄花公路北段），全程约200公里。其筑路费用均由张连生向襄樊、光化与枣阳一带的商绅捐募，全路施工所用工夫由沿线百姓承担，实行分段包干或轮换劳作方式，在旧驿道或官道的基础上加以平整、因陋就简进行建筑。经过数月紧张实施，于1923年春，老河口至樊城90公里地段宣告竣工。继至1924年3月，接通由樊城、双沟、枣阳至随阳店一百一十公里地段。襄花路北段的拓建工程，作为襄阳镇守使的张连生起了重要的倡导和推进作用，为表彰他的功绩，襄人于襄花公路侧铸张连生铜像一尊，并称其路为张氏大街（一说为仲三街，以其字命名），告藉后人不忘其德。鉴于张连生极力促成官商合办公路的议案，并于湖北督军肖耀南与襄阳道尹熊宾之间的斡旋之劳，及在襄阳地区修筑公路中的名望和做出的贡献，1923年3月29日襄阳道路分会成立时，张连生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张连生驻节襄郧期间，正值中国工运学潮迭起之时，为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1923年至1925年间曾出面参予迫害肖楚女和镇压学生运动。

此间，张连生为振兴家乡教育，由他出资在家乡烧角村修建“民国小学”一所，便于烧角、阎各庄、艾各庄等乡闾农家子弟读书。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暴发后，直系军阀总司令吴佩孚在正面战场不利的情况下，决意从襄阳南阳迂迴进攻信阳。派属员

李炳之游说早已脱离吴的张连生和南阳镇守使马志敏允予假道，并加以支援。张连生与李会面后慨然应允，并决定派所部王宗荃旅归李炳之指挥，并随同去南阳以壮行色，为此次对奉作战起了一定作用。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克武昌，吴佩孚溃逃洛阳。国民革命军总部高参唐静策动张连生起义，张权衡了局势后易帜，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师，12月正式就任第九师师长。仍在原地驻防。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张连生听从了国民党命令，解散了第九师政治部，通辑共产党员。在宁汉分裂期间，蒋汪对立。蒋介石手下大员夏斗寅电约张连生由鄂西北沿襄花公路向汪精卫进攻。张连生则静观待变，未允其约。

四、三十八军军长

1926年初，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据守河南后，觊觎襄阳。张连生自知兵力孤单，无力与之抗衡。3月18日，张派冯玉祥手下大将孙良诚的表兄、第九师旅长王锦堂为代表，去冯处请委。冯玉祥当时正与原部属刘镇华和奉军万福林作战，当即委张连生部以三十八军的称号，任张连生为三十八军军长、总指挥，仍驻镇襄郧。

军阀混战时期，各实力派大多采取拥兵自重、隔岸观火的策略以求自存。兼之如张连生这样出身繁复，念旧重义之人，行止更为错综难决。既要遵从实力雄厚军阀的意愿以保不至被吞没；又要顾念旧主以免遭世人之讥。此时依附了冯玉祥的张连生采取了多数军阀所贯用的"壁上观"策略。6月底在冯吴战事紧迫时，冯命张连生在襄河上保障由武汉运来的各项军需品的安全。吴佩孚深知此运线的意义重大，以旧部上司的名义严饬张连生阻断冯军的运输线。张连生面对两道命令，夜不能寐，徘徊难决。既不能料冯吴战局，又不愿得罪冯吴各方，故采取了权宜之计：暂先扣住

冯部的军需和人员，静待战局变化。此举对冯玉祥震动很大。使冯对自己认为是“老老实实作官”的张连生结下了很深的怨隙。随着冯胜吴败的定局，张连生送还了扣押的冯军人员和器械。7月2日，吴佩孚被冯部方振武等追逐，由巩县入新野窜至襄阳，准备经老河口奔向四川。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张连生堵截。张连生知道，吴既败则冯将难赦其扣人械之咎，再得罪国民政府势必无法存身。当即命炮兵隔河向吴残部炮击！打死打伤吴部多人，吴的亲信秘书长张煌言被击毙，吴夫妇幸以身免。但在执行堵截命令时又顾念与吴的旧情，钦佩吴的胆识为人，有意网开一面，使吴得以率残部200余人由竹条铺渡汉水逃入四川。张连生以此功劳作为向冯表示忏悔的进见礼，表面上得到冯玉祥的谅解。但不久冯玉祥调张部到郑州，襄郾防地转交给自己信任的嫡系方振武接管。张连生到河南后，被拨至曾为冯对奉作战时立下战功，视为嫡系的韩复榘部下节制。彼时同为西北军，张连生与韩复榘、石友三情谊深重，遂结为盟契之好。张以年长被韩石二人尊为大兄。当时冯部人马众多（近30万），但作战时冯多为所收杂牌军作先锋，故冯与各部将领间隔阂颇多，刘镇华、靳云鄂、张连生等对冯心生不满，几至兵戎相见。被收编诸将也一直未得到冯的真心信任。冯在郑州与奉军交战时，正如冯所说的“刘镇华不奉命令”，“靳云鄂对我不满”，“樊钟秀误会未消”，“张连生和于学忠瞪着眼”，日子很不好过。冯对张连生等表面愈为客气，张连生愈觉有潜在危险，故于1928年初密令已任第二集团军旅长的堂弟张连文辞职还乡以留骸骨，一面自己加意提防。同年2月间，冯玉祥以视察部队为名，命张连生部于操场前列队，值日官一声令下：“枪放下，齐步走！”待张部走出数步，后面冯的嫡系部队收缴了张部的枪支。张连生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部队被分编到第一军各师。张本人被调任总司令部任副总参谋长。此时明升暗降、有职无权的张连生追悔莫及，一怒之下毅然卸甲归田，结束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